



赴日宋僧
无学祖元研究

江静 著



商務印書館

本书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

江静 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江静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12
(中日文化交流新视域丛书)
ISBN 978-7-100-07530-5

I. ①赴… II. ①江… III. ①无学祖元(1226~
1286) —人物研究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420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

江静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530-5

2011年2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7/8
定价: 29.00 元

总序

在通常的学科分类目录中，“中日文化交流史”一般归入“专门史”门类，但其本质应当属于交叉学科，不仅其外延覆盖中国史和日本史，其内涵还涉及思想、宗教、法制、民俗乃至文学、艺术、社会、经济等人文社科的方方面面。

尽管作为一门学科地位尚不甚稳定，然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均有深厚的积淀。总体上说，日本起步较早，成果也颇丰硕；中国急起直追，点面均有突破。

日本方面的代表性成果，首推辻善之助的《增订海外交通史话》与木宫泰彦的《日华文化交流史》，虽都成书于半个多世纪以前，但依然不失为经典，尤其木宫泰彦的著作经胡锡年汉译，成为众多中国学者案头必备之书；其次是森克己围绕“日宋贸易”的系列作品，即《日宋贸易之研究》、《续日宋贸易之研究》、《续续日宋贸易之研究》、《日宋文化交流之诸问题》，以网罗史料齐全见长；再则是田中健夫，成果集中于元明时代，如《对外关系与文化交流》、《中世对外关系史》等，继承森克己学脉而多有创新。除此之外，实藤惠秀的中国留日学生、大庭修的中日书籍交流、池田温的中日法制交流、小曾户洋与真田柳的中日医学交流等研究，均有开拓之功。近十余年来，更呈群贤

辈出之势，如森公章、山内晋次、榎本涉、河野贵美子等，各有建树，令人刮目。

回观中国，在民国时期的抗战硝烟中，虽偶有吉光片羽的佳篇力作，如王辑五的《中国日本交通史》等，但基调一直比较低迷；新中国成立后，硝烟已散，敌意未消，此门更趋凋零。迨及 20 世纪 70 年代，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研究才渐成气候。

由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交叉学科特性，涉足该领域的学者也颇庞杂，除了日本学专家，专治国学各科专家也参与其中，依托各自学科领域的深厚功底，急起直追，以致短时间内后来居上，在局部点面屡出新意。

如在文学领域，严绍璦《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与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堪称珠联璧合，开创中日文学交流史新生面；在考古分野，王仲殊围绕“三角缘神兽镜”撰文著书，提出“东渡吴人制镜说”，震撼东瀛；于人物专题，韩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沈殿忠等《中日交流史中的华侨》，拉近了与日本学界的距离；哲学思想方面，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日中儒学之比较》不拘旧说，创意间出；书籍交流方面，严绍璦《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王勇等《中日“书籍之路”研究》等，文献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尤其架构“书籍之路”理论备受关注；古代史有汪向荣《古代的中国与日本》、王金林《奈良文化与唐文化》等，均有日文版问世；近代史有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严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等，颇得学界好评。此外，在港台地区，郑梁生的明代中日关系史研究、高明士的隋唐东亚教育圈研究、谭汝谦的中日书籍互译研究等，均独树一帜，不可忽视。

如上所述，“中日文化交流史”涉及中日两国历史文化，日本虽然

起步较早，但论者多依据本国文献史料、立足于本国历史文化、拘囿于传统史学观念，所以涉及日本大抵考证精当，事关中国或多语焉不详。中国的情况则稍有不同，主要有两点：涉足此门的学者基本上精通日语，又能读懂艰涩的日本古代汉文史料，语言优势为其一；在吸收日本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发掘中国文献中的相关史料，对传统的学说或观点加以佐证或修正，继而提出新见解，史料优势乃其二。

正因为上述原因，中国学界虽起步较晚，但近数十年来进步神速，在某些点甚至面，呈现后来居上之势。前述许多学者的著作在日本出版发行，以及王仲殊获“福冈亚洲文化赏”、严绍璁获“山片蟠桃赏”、王晓平获“奈良万叶世界赏”、严安生获“大佛次郎赏”等日本重要学术奖项，说明该领域的中日学者，已经进入平等切磋的新阶段。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周一良、严绍璁、王勇联袂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0卷本问世，该丛书由中日双方各20余位知名学者执笔，同时在日本发行日文版，该丛书荣膺“亚太出版商联合会”学术类图书金奖，堪称中日学者联手营造这块学术园地的结晶。

本丛书聚焦于“中日文化交流史”，既顺应上述国内外学术界的大趋势，也反映出各位作者归属的学术团队的小背景，在这里有必要作个交代，以助读者了解每部作品的来龙去脉。

在日本研究渐趋兴盛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本人在杭州大学创建了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在“专门史”学科点招收“中日文化交流史”方向硕士研究生；1998年该中心随“四校合并”而改称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遂在“中国古代史”学科点招收“中日文化交流史”方向博士生；2004年本人因故调离浙江大学，8名博士生最后挂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完成学业。

1989年创建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之际，我把研究重点定位在“以书籍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并以开放模式运作科研项目，广邀国内外同道合作攻关。这些成果大多汇入《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中日汉籍交流史论》、《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奈良平安时期的日中交流——以书籍之路为视点》、《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诸书，先后在国内外出版。

我在浙江大学培养的8名中日博士生，虽然各自的专攻年代不同、侧重的领域相异，但一个共同特点是注重文献史料。回忆陈年往事，每周举办“读书会”的情景历历在目。桌子上堆满各类字典及参考文献，然后一字一句注释中日文献的相关史料，这些虽然看似枯燥乏味，但因此打下比较坚实的文献学基础。看到日后这批学生从“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当年的辛劳也不再觉得苦涩。

自从2000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生，算来时光已经流逝了10个春秋，现在他（她）们大多晋升为副教授或教授，在国内外高校独当一面。虽天各一方，但学脉相承，学术上的交流愈趋频繁，擘画这套丛书可谓水到渠成。然以“新视域”括之，我想大概以下几条可作依据。

首先，本丛书纵向由隋唐及宋元再至明清，每个朝代均有专著，上下衔接，自成体系；横向则涵盖历史、宗教、文化、教育、贸易诸分野，展现文化交流之丰富多姿。

其次，作者均精通日语，对日本学者的成果细心咀嚼，经过吸收与扬弃，依托国学底蕴、立足中国史观，敢于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新见识。因此，这些著作即使放到日本学界，相信也不会逊色。

再则，作者都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文献学训练，对书中引用的大量中日古代汉文史料，不仅在断句、训字、释词诸方面用力颇勤，在文意的诠释、史料背景的推断上也有创见。

还有，整套丛书虽聚焦于“中日”，但作者视野多兼及东亚，在东亚文化互动的大背景下，审视追踪中日文化交流的历程。从传统的文化双向交流研究，进化到区域文化环流研究，符合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

最后，各卷作者均有在日本长期留学或执教的经历，受到中日两国学术氛围的熏陶；而且，他们在攻读博士期间，辗转于“历史学”和“文献学”两个学科，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双重的学科背景来研究这个跨学科的主题，相信会有独到的发现。

本套丛书初拟八卷，即隋唐两卷、宋代两卷、元代一卷、明代一卷、清代两卷，虽然总体上由隋唐而明清，似乎串接成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然元明时代略显单薄；加之各卷的主题也未能一以贯之，如隋唐部分偏重于书籍与人物，宋元明部分围绕佛教，清代则以教育和贸易为主。我们这个团队酝酿已久的一个计划，便是合作撰写断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届时或可弥补本丛书留下的缺憾。

这套丛书若能给读者传递“新视域”的些许愉悦，给“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吹入几丝新鲜气息，则所愿也。

王 勇

2010年11月30日

凡例

一、征引文献中，阙字用“□”号表示，阙几字用几个“□”，根据上下文义能够辨认者，则在残缺之字外加方框表示。如“因”表示“天”字原阙，根据文义补出。原文献中的注释，为保持原状，用小字标示。引文中“()”内的文字，为笔者解释性文字。引文中的讹字，在原字后用“[]”注出正字。异体字保持原样。对于祖元语录的摘引，不同文献的记载可能有所不同，在文字无误的情况下，皆忠实所征引的文献，不作修改。

二、文中出现的年号根据事件发生的国家标注，如发生在日本，就用日本年号；发生在中国，就用中国年号；若此事件与中日两国同时有关，则标注两国年号，如“南宋景定元年（日本文应元年，1260）赴日”。同一节中出现的年号，只在首次出现时标注公元纪年。

三、正文及脚注中征引的日本汉文古籍名称、征引的内容，一般径改为简体字。如无简体字，则用繁体字。异体字保留原样。一些日本国字，则保持原状。正文及脚注中出现的今人日文研究著述名及版本信息，一律译成简体中文。

四、文末的征引及主要参考文献中的中文文献题名、作者及出版事项等一律使用简体。日文文献题名、作者及出版事项等均按照日文原文形式标记，不再改成中文通行的简体，也不再翻译成中文。

五、来自日本文献中的汉文引文，若不特别注明，皆为原文，非笔者译文。

目录Contents

绪论	1
----	---

第一章 南宋、元时期的中日关系与文化交流	12
----------------------	----

第一节 忽必烈的遣使与东征	12
---------------	----

第二节 宋元时期的中日贸易	24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僧侣往来与禅宗东传	35
--------------------	----

第二章 无学祖元的传记资料	60
---------------	----

第一节 行状	61
--------	----

第二节 塔铭与碑铭	67
-----------	----

第三节 僧传	74
--------	----

第四节 《〈塔铭〉集注》和《年谱》	79
-------------------	----

第三章 无学祖元的生平行履	81
---------------	----

第一节 赴日前行履	81
-----------	----

第二节 东渡扶桑	105
----------	-----

第三节 赴日后事迹	117
-----------	-----

第四节 祖元事迹在后世的流传	138
----------------	-----

第四章 无学祖元在日期间的交游	143
第一节 与北条时宗的交往	143
第二节 与圆尔辩圆的交往	158
第三节 与无象静照的交往	169
第五章 《佛光国师语录》研究	179
第一节 《佛光国师语录》的编者与主要内容	179
第二节 《佛光国师语录》的版本	186
第三节 《佛光国师语录》的价值与流布	212
第六章 日藏祖元墨迹研究	223
第一节 日藏祖元墨迹	224
第二节 祖元墨迹在中世禅林的流传	242
第七章 无学祖元的禅观与禅法	245
第一节 对“看话禅”、“文字禅”的认识	245
第二节 对自悟本性与修禅实践的强调	254
第三节 活泼细腻的“老婆禅”	262
第八章 无学祖元的弥勒信仰、儒学思想及神道信仰	269
第一节 无学祖元的弥勒信仰	269
第二节 无学祖元的儒学思想	281
第三节 无学祖元的神道信仰	292
第九章 日本禅宗史上的无学祖元	
——以法脉传承为中心	300
第一节 无学祖元的法系传承及主要嗣法弟子	301

第二节 一翁院豪与祖元禅法在长乐寺的传播	304
第三节 高峰显日及梦窗派的繁荣	317
第四节 无外如大与正脉院的创立及发展	336

第十章 日本文学史上的无学祖元

——以五山文学为中心	343
------------------	-----

第一节 日本五山文学概说	344
第二节 无学祖元的诗偈创作——理论与实践	353
第三节 祖元诗偈在后世禅林的流播	369
第四节 佛光派在五山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386

结语	392
----------	-----

附录一 无学祖元年谱简编	397
--------------------	-----

附录二 日藏无学祖元相关文物	414
----------------------	-----

征引及主要参考文献	421
-----------------	-----

后记	435
----------	-----

绪论

宋元时期，中日两国虽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因为两国商人及僧侣往来的频繁，宋元文化依然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中意义最为重大者，当属禅宗的东传。“日本在镰仓时代奠定了长达 600 多年的由武士占支配地位的政治体制，禅宗为建立适应这种体制需要的文化和协调武家与朝廷关系的伦理观念起了重要的作用。”^[1] 具体而言，在政治上，它巩固了幕府的统治地位，协调了朝廷与幕府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上，学禅修禅成为数百年经久不衰的社会潮流；在文化上，它对五山文学的兴起、茶道、花道、剑道、武士道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朱子学的传播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在这个过程中，“一批德行高洁、学养丰富的中国禅僧东渡日本，他们在弘扬禅风的同时，积极传播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直接参与镰仓文化的创建，其功不可没”^[2]。

[1]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8 页。

[2] 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2 页。

在众多的东渡僧中，无学祖元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具有颇高的研究价值。这首先因为他是历史名人。在日本，无学祖元的名字出现在很多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除了知名度，我们研究祖元主要出于以下考虑：首先，作为在南宋灭亡之年赴日的高僧，他的东渡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其次，在日本禅宗史上，他殚心竭虑弘扬宋朝禅风，呕心沥血培养日本弟子，为禅宗扎根日本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再次，他积极参与文学指导与创作活动，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为五山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他开创的佛光派是五山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派别。最后，祖元在日交往的对象包括以北条时宗为首的上层武士，通过他，我们能了解日本当权者的宗教信仰及文化活动，特别是祖元赴日正值忽必烈两次东征前后，透过祖元，我们能看到时宗在此事件中的态度和对策。

既然是如此重要的人物，就免不了成为中日学界关注的对象。迄今为止，学界对他的研究涉及事迹、思想、文学作品、贡献及相关文献整理等多个方面。

祖元的事迹及影响是研究祖元首先要涉及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至14世纪末，祖元法孙中山法颖为《佛光禅师塔铭》作注，同时为祖元编写年谱，虽然《年谱》的内容极为简略，但其首创之功不可抹杀。江户时代，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僧人元师蛮编写了僧人传记《延宝传灯录》和《本朝高僧传》，其中的《祖元传》介绍了祖元的事迹，摘引了祖元部分语录。师蛮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中日两国僧俗人士为祖元撰写的诸种行状、塔铭及语录。1897年，鹭尾顺敬在《祖元禅师的化风》一文中认为，祖元在日本的教化力量极大，究其原因，当有两点：一是祖元具有强烈的祈求日本国民平安的诚挚之心，二是

他有成为日本人、终老日本的美好愿望。^[1] 该文竭力主张日本佛教界人士以祖元为榜样，到中国和朝鲜传教，具有较强的政治目的，明显受到右翼国粹主义思想的影响，其结论亦不具说服力。1908年，他又发表了《佛光禅师的渡来》^[2] 一文，对北条时宗邀请祖元来日的背景和经过作了介绍，现在看来，内容颇为简单，但在当时，具有补白的意义。玉村竹二是较早对祖元进行过较为全面研究的学者。1952年，他撰写了《佛光国师无学祖元》^[3] 一文，虽然是发表在《日本历史》杂志“人物素描”栏目中的文章，内容比较简单，但是，其对祖元事迹的考察和评价不再单纯依赖传记，而是用了《语录》中的不少资料，颇多新意和创见。此外，他还撰写了《佛光国师与环溪惟一》^[4]、《关于弘安六年七月十八日无学祖元尺牋之私见》^[5] 等文章，虽然只是介绍性的短文，却为后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作为日本禅宗史研究的大家，玉村竹二还撰写了大量与日本禅宗典籍、制度、人物、建筑等有关的论文，其中，有些论文虽然不是专门研究祖元，却也解决了不少与祖元有关的问题，比如，《禅僧称号考》^[6] 弄清了佛光派弟子的系字问题，

[1] [日]鹭尾顺敬：《祖元禅师的化风》，原载《和融志》第9卷第11号（1897年11月），后收入《日本禅宗史的研究》，教典出版1945年版，第163—167页。

[2] [日]鹭尾顺敬：《佛光禅师的渡来》，原载《宗教界》第4卷第5号（1908年5月），后收入《日本禅宗史的研究》，第158—162页。

[3] [日]玉村竹二：《佛光国师无学祖元》，原载《日本历史》第44号（1952年1月），后收入《日本禅宗史论集》上，思文阁1976年版，第381—386页。

[4] [日]玉村竹二：《佛光国师与环溪惟一》，原载《圆觉》第1号（1956年1月），后收入《日本禅宗史论集》下之一，思文阁1979年版，第1923—1924页。

[5] [日]玉村竹二：《关于弘安六年七月十八日无学祖元尺牋之私见》，原载《日本历史》第200号（1965年1月），后收入《日本禅宗史论集》上，第1207—1212页。

[6] [日]玉村竹二：《禅僧称号考》，《日本禅宗史论集》上，第21—94页。

《关于五山丛林的塔头》^[1]提到了祖元塔头正续庵的规模及末寺情况，玉村竹二的所有上述论文皆在七八十年代编入三卷本的《日本禅宗史论集》中。玉村竹二的另三部大作是1964年出版的《圆觉寺史》和1985年出版的《五山禅林宗派图》、《五山禅僧传记集成》。《圆觉寺史》首次对祖元的生平、交友、著述及法脉传承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五山禅林宗派图》梳理了包括祖元在内的五山禅僧的法系传承情况，《五山禅僧传记集成》为活跃在14到16世纪初五山禅林的790名禅僧的传记，虽然没有祖元传，但有不少佛光派弟子的传记，这三部书是我们研究祖元必备的参考书。1980年，平方和夫在《关于长乐寺一翁院豪——从黄龙派到佛光派》^[2]一文中，讨论了祖元与院豪往来的六封书简，认为院豪嗣法祖元决定了长乐寺未来的发展方向。1987年，芳贺幸四郎在《渡来禅僧及其业绩》一文中，将祖元赴日功绩总结为以下三点：一是在精神上锤炼北条时宗，帮助其渡过“弘安之役”的大难关；二是宣扬纯粹的宋朝禅，培养出一批非常杰出的弟子，佛光派日后成为日本禅宗界的主流，大力推进日本禅宗的进步，其原动力来自祖元；三是促进了禅宗在武士社会的扎根，影响了武士道精神的形成。^[3]总而言之，关于祖元赴日前的生平事迹，学界基本是以诸种传记资料的记载为依据。对祖元赴日后的事迹及贡献，由于传记资料的记载比较简略，学界有过一些研究，但仍不够充分。

祖元东渡的原因也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玉村竹二在其名著

[1] [日]玉村竹二：《关于五山丛林的塔头》，《日本禅宗史论集》上，第197—244页。

[2] [日]平方和夫：《关于长乐寺一翁院豪——从黄龙派到佛光派》，《驹泽史学》第27号（1980年3月）。

[3] [日]芳贺幸四郎：《渡来禅僧及其业绩》，鹿野山研修所论丛编纂委员会编：《中世日本的禅及其文化——主要以临济禅为中心》，鹿野山禅青少年研修所1987年版，第37—43页。

《五山文学：作为大陆文化介绍者的五山禅僧的活动》一书中认为，南宋末年中国禅僧大量来日的一大原因是蒙古入侵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南宋灭亡后，因不愿接受“异民族”统治而亡命日本的禅僧增多。^[1]此观点在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2]1982年，中国学者夏应元发表了《中国禅僧东渡日本及其影响》一文，其中也提到祖元赴日有南宋灭亡之际“政治避难”的因素，同时分析了祖元帮助日本抗击元朝“侵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南宋遗民的身份，以及对元朝统治者的不满和对日本的友好感念之情。^[3]1996年，他又参与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0·人物卷》^[4]的撰写，其中的“无学祖元”一节，基本是建立在前篇文章的基础之上，内容略有增补。1999年，西尾贤隆在《中世的日中交流与禅宗》一书中，反驳了玉村竹二、夏应元等学者的意见，认为包括祖元在内的僧人赴日没有丝毫“亡命”的因素，因为元朝政府对所有宗教采取无差别尊崇的政策，赴日禅僧在元朝即使不能成为五山住持，也能成为十刹、甲刹等官寺的住持，没必要逃亡国外。至于战争中寺院被毁等现象，是出现在任何一个王朝末年乱世中的现象，与异民族征服战没有特别关系。^[5]2000年，马俊民在日本发表了《元代

[1] [日]玉村竹二：《五山文学：作为大陆文化介绍者的五山禅僧的活动》，至文堂1985年版，第37—38页。

[2] 川添昭二在《镰仓时代的对外关系及文物的传入》（《岩波讲座日本历史》6，1975年）、广濑良弘在《镰仓期的渡来僧》（《历史公论》第9卷第2号）、芳贺幸四郎在《渡来禅僧及其业绩》（《中世日本的禅及其文化——主要以临济禅为中心》，1987年）、夏应元在《中国禅僧东渡日本及其影响》（《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等文中皆支持这一观点。

[3] 夏应元：《中国禅僧东渡日本及其影响》，《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4] 王勇、[日]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0·人物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242页。

[5] [日]西尾贤隆：《中世的日中交流与禅宗》，吉川弘文馆1999年版，第1—15页。